

# 析論楊簡、袁燮對《書序》、《詩序》之依違 ——南宋心學家對傳統經解態度的一個側面

黃忠慎\*

(收稿日期：107年1月17日；接受刊登日期：107年10月9日)

## 提要

本文觀察陸九淵高足楊簡、袁燮對《書序》、《詩序》之依違，透過本文可以發現，在《尚書》方面，楊簡同意〈尚書序〉出自孔安國之手，但他直斥「孔安國不知道」。對於舊謂孔子所著各篇〈小序〉，楊簡曾推測亦為孔安國所作，但在解經之時，楊簡依然依《書序》之內容以解經。在《詩經》方面，楊簡認定《詩序》出自漢儒衛宏之手，完全不能接受其說。袁燮的態度則又不同，他對於〈尚書序〉與《尚書孔傳》並無興致，但卻深信孔子創作百篇《書序》，又認為《詩序》「知道」，故願意接受《詩序》之詮釋。

至此，吾人可知，心學家可以信守也可以揚棄傳統的解經成果，其中的關鍵就在傳統是否可以「知道」，而「知道」與否的判準主要還是由自己的主觀操控，也由此而讓心學家的解經成果出現同中有異的現象。

關鍵詞：《書序》、《詩序》、心學家、楊簡、袁燮

---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特聘教授。

## 一、前言

宋代學術史上的朱（朱熹，1130-1200）陸（陸九淵，1139-1192）兩派之爭，核心爭執點是在理學中的「性即理」與「心即理」之中心命題，<sup>1</sup>其次，「道問學」與「尊德性」之輕重先後，也是劃分兩派治學取向、精神的一大標誌。<sup>2</sup>

南宋陸學一派雖然鼓勵學者追求心靈之領悟，但從未主張廢書不讀，陸九淵本人不僅勤於閱讀經典，<sup>3</sup>也在書院講學，<sup>4</sup>甚至公開指斥時人「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現象，<sup>5</sup>其不喜者為繁瑣的傳統章句注疏之學，認為讀書宜仔細玩味，以精熟為貴，故陸氏平生講學固以啟發人之本心為主，但仍「間舉經語為證」。<sup>6</sup>

<sup>1</sup> 馮友蘭：「朱熹支持程頤的說法，認為『性即是理』。而陸九淵卻說：『心即是理。』這兩句話相差只一個字，卻是兩個學派基本分歧之所在。」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頁267。

<sup>2</sup> 陸九淵門下朱亨道有一段記載：「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朱與陸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辯，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宋·陸九淵著，鍾哲點校：《年譜》，《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36，頁491。

<sup>3</sup> 陸象山勤於讀書，《陸九淵集》記載：「……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為勤，他人莫及。」〈語錄下〉，《陸九淵集》，卷35，頁463。「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為學，即是讀書。』而以『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反說為證，以『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虛說為病。平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兄每夜必見其觀覽檢閱之不輟，嘗明燭至四更而不寐。欲沉涵熟復而切己致思，欲平淡玩味而冰釋理順，此則與徒乾沒於訓詁章句之末者大異。何不知者反妄議其不以讀書為教哉？」宋·陸九淵著，鍾哲點校：《年譜》，《陸九淵集》，卷36，頁531。

<sup>4</sup> 全祖望：「厚齋謂嶽麓、白鹿以張宣公、朱子而盛，而東萊之麗澤、陸氏之象山，竝起齊名，四家之徒徧天下，則又南宋之四大書院。」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答張石癡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收入沈雲龍編：《明清史料彙編》第9集第5冊（總第47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卷45，頁4019。案：象山書院位於信州貴溪（今屬江西）應天山。淳熙14年（1187），陸九淵應門人彭世昌之請，「登而樂之，乃建精舍」講學，而宋代書院具有講學、藏書、祭祀三大主要教育功能，謂象山於講學期間常率學生尋訪山川名勝，陶冶情操，開拓視野，此事固有，但若謂象山書院傳心學而不藏書、不讀書，恐無此理。相關論述可參王曉龍、司學紅：〈宋代書院教育〉，《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4期（總第136期）（2007年7月），頁80-82；王晶、王凌皓：〈南宋四大書院之教學藝術美〉，《現代教育科學》2009年第6期（2009年6月），頁39-42。

<sup>5</sup> 宋·陸九淵著，鍾哲點校：《年譜》，《陸九淵集》，卷34，頁419。

<sup>6</sup> 陸九淵：「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不可草草。」「讀書最以精熟為貴。」馮元

楊簡(1141-1226)與袁燮(1144-1224)為陸九淵高徒,<sup>7</sup>面對經典,心學家的基本態度大致相同,以為其最高作用就在印證本心之道,<sup>8</sup>在此前提之下,楊簡處理《慈湖詩傳》,使之成為其闡發一己心性、印證體悟的一種方式,<sup>9</sup>而其《五誥解》亦帶有部分心學成份。<sup>10</sup>至於袁燮則是擅長以「本心」解說詩文大意,並且賦予此心以仁義的內容,以及某種超驗、神秘的意味,這正是其《黎齋毛詩經筵講義》的特質之一,<sup>11</sup>而其《黎齋家塾書鈔》亦以發明本心、敷暢陸氏之說為要旨。<sup>12</sup>由於這樣的解經特質為傳統所無,因此我們可以稱心學家的注經成果為新時代的解經文本。然而,詮釋意涵的大幅翻新,不代表對於傳統就可以完全背離。僅以楊簡的解《詩》為例,其在詮解經文時,所闡述的重心固然為經中

質謂陸象山：「非徒講經，每啓發人之本心也。間舉經語為證。」以上分見宋·陸九淵著，鍾哲點校：《年譜》，《陸九淵集》，卷36，頁501；《與齊必先》，卷14，頁186；《語錄下》，卷35，頁432。

<sup>7</sup> 《宋史》記載，「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黃宗義在《宋元學案·象山學案》中將楊簡列為象山門人之首，分詳元·脫脫：《宋史》第35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407，頁12289；清·黃宗義原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58，頁1881。《宋史》又記載，「袁燮，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燮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磋。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元·脫脫：《宋史》第35冊，卷400，頁12146-12147。

<sup>8</sup> 案：心學肇端於孟子，大興於宋明，本文所謂南宋心學家主要是指陸門學者，此派固然最重本心，但亦尊重傳統經典之研習，當然其閱讀態度不同於朱門學者，以楊簡為例，楊氏以為進德修學可先讀聖人之書，以此「開悟」本心，然仍堅持義理的獲取必須「求諸己」。楊簡以為認知的結果絕不是知識的增長，而是人的某種境界的確立，而境界的開拓要不斷地「求己」，對本心有所體悟。詳黃忠慎：〈心學語境下的《詩經》詮釋——楊簡《慈湖詩傳》析論〉，《輔廣、楊簡《詩經》學研究》（臺北：經學文化事業公司，2017年），頁57-61。再者，袁燮固然亦從「接中原文獻之正傳」之呂祖謙游，「所得益富」，又與陳傅良「從容考訂，細大靡遺」，但師友多方，在當時亦屬常態，以中心思想觀之，袁燮依然屬於心學家。關於袁燮師友呂祖謙、陳傅良，見宋·真德秀：《西山文集·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府袁公行狀》，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47，頁760：25a-25b。

<sup>9</sup> 詳黃忠慎：〈輔廣《詩童子問》與楊簡《慈湖詩傳》之比較研究——以解經方法、態度與風格為核心的考察〉，《輔廣、楊簡《詩經》學研究》，頁160。

<sup>10</sup> 《四庫全書總目·五誥解提要》：「簡受學於陸九淵，好舉新民保赤之政，推本於心學。又當《字說》盛行之後，喜穿鑿字義，為新奇之論。措辭亦迂曲委重，未能暢所欲言。然如《康誥》言『惠不惠，懋不懋』，則歸重於君身；『服念旬時』，則疑孔《傳》三月為過久；《酒誥》『厥心疾很』，指民心而言；《召誥》『顧畏於民畷』，謂民愚而神可畏如畷險；《洛誥》『公無困哉』，謂因有倦勤之意。皆能駁正舊文，自抒心得。」清·紀昀等著，魏小虎彙訂：《四庫全書總目彙訂》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11，頁352。

<sup>11</sup> 詳黃忠慎：〈心學與政治之間——袁燮《黎齋毛詩經筵講義》析論〉，《臺大中學報》第52期（2016年3月），頁115-116。

<sup>12</sup> 《四庫全書總目·黎齋家塾書鈔提要》：「燮之學出陸九淵。是編大旨在於發明本心，反覆引申，頗能暢其師說，而於帝王治蹟，尤參酌古今，一一標舉其要領。」清·紀昀等著，魏小虎彙訂：《四庫全書總目彙訂》第1冊，卷11，頁353。

義理的發揮、辨明，然其針對單字詞句進行集釋者，也頗常見，可謂兼具漢學與宋代心學解經的特色，<sup>13</sup>這也表明了一個事實，自唐代研創新經學，至宋代經學的新解蠶起，學者再怎麼質疑、批評傳統，傳統依然有意無意地滲入了新的經典研究成果之中。<sup>14</sup>雖然如此，筆者仍然必須指出，宋代儒者的解經本來就以勇於創新著稱，雖然各家創新的表現方式不盡相同，但在傳統不必也無法全面斷絕之下，<sup>15</sup>宋代新經學引起後人高度重視的，自然不是呈現在文字釋義成果這一個層面，而是其為經典帶來的詮釋新風貌。

就《尚書》、《詩經》而言，傳統解經成果中的《書序》、《詩序》引領了讀者對於二部經典內容的基本認知。理論上，宋儒若欲對《書》、《詩》二部經典有新的詮釋，面對《書序》、《詩序》就很難全面接受，<sup>16</sup>且反對的理由必須充分，再輔以不同於傳統且自成一套

<sup>13</sup> 詳黃忠慎：〈《詩經》註我，我註《詩經》——楊簡《慈湖詩傳》再探〉，《輔廣、楊簡《詩經》學研究》，頁91。

<sup>14</sup> 郭善兵：「中唐以後，經學界，尤其是以啖助、趙匡為代表的新《春秋》學派，不盲從先儒成說和惟古訓是尊，而是在繼承前儒學說的同時，依據自己對經典文義的理解，敢於疑古，勇於創新。這種學術風尚為宋儒所承襲。他們在懷疑、批判乃至否定漢唐時以名物訓詁為主要治學方法的經學詮釋傳統的同時，逐漸形成了以探究經典內在義理為主要特徵的『宋學』經學詮釋體系。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宋儒對漢唐儒者的經典注疏持有較為激切的懷疑、批判，但沒有視其為敝履。而是在繼承的同時，又結合自己對經典文義的理解，多有損益、創新之處。這一點，據宋儒對儒家經典記載的周代天子宗廟禮制的詮釋，可得一具體的反映。」郭善兵：〈略述宋儒對周天子宗廟禮制的詮釋——以宗廟廟數、祭祀禮制為考察中心〉，《東方論壇》2006年第5期（2006年10月），頁99。

<sup>15</sup> 經典是傳統的產物，後期讀者可以質疑、修正早期讀者的經典詮釋，然而正如周華山所言，「歷史和傳統是我們閱讀理解的前提，閱讀理解過程也同時在生產歷史和傳統。閱讀就是對既有歷史和傳統重新整理和批判，歷史建構我們的閱讀，我們的閱讀也反過來營構歷史。閱讀既是意義的生產過程，意義生產亦同時賦予、增添與豐富作品的內涵。我們每次的閱讀均在參與作品的生產過程，成為作品內涵的一部分。閱讀遂成為一個批判過程。在詮釋循環裡，作者、作品與讀者三方面的意識型態和盲點死穴不斷在來回往返的情形下被揭示和挑戰。」詳周華山：《「意義」——詮釋學的啟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137-139。

<sup>16</sup> 以朱熹為例，其對《書序》與《詩序》之批評遍見《語類》二部經典之專卷，茲僅各舉一條：「《尚書·小序》不知何人作。《大序》亦不是孔安國作，怕只是撰《孔叢子》底人作。文字軟善，西漢文字則龐大。」「《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今人不以《詩》說《詩》，卻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5冊（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年），卷78，頁1985；第6冊，卷80，頁2076。案：朱熹雖未親自為《尚書》作傳，然於離世前一年囑其弟子蔡沈撰寫《書集傳》。蔡沈承朱熹辨偽古文、偽孔《傳》及《書序》之論，故將《書序》單獨集中附於書後辨析之，又將《尚書序》列之於後，亦全篇予以疑辨。其書仍保存東晉本58篇經文，皆為之作傳，唯在每篇篇題下注明「今文古文皆有」或「今文無古文有」，以此而暗示「今文有」者乃漢代真《尚書》，「今文無」則為晚出。此外，蔡《傳》雖與朱熹注經體式有所差異，但從現有材料比較來看，在訓詁義理方面，蔡《傳》訓詞多本朱子，改易不多。義理則一本朱子理本體論、氣稟物欲之人性論、道心人心之道統說、皇極之正君思想闡釋《尚書》，又頗得朱學之精神。詳劉起鈺：《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系統的詮釋內容，如此才能提出經學新解。不過，心學家的解經態度未必符合這樣的基本理論，除非《書序》、《詩序》妨礙了心學家以闡發、印證心性為主的解經進路。本文研究楊簡、袁燮對《書序》、《詩序》的態度，觀察楊、袁二氏對於傳統解經的依違，並對其現象進行解釋，以為這可以見出南宋心學家解經的一個側面，甚至還可以補經學史描述陸門學者解經之不足。

## 二、楊簡對《書序》與《詩序》的態度

### （一）《書序》

經學史言及《書序》，往往將之區分為大小〈序〉。東晉本古文《尚書》收有舊題漢儒孔安國（孔子十二代孫，約 156-74B.C.在世）撰的〈尚書序〉，世人稱此為〈大序〉，各篇篇題之後又有交待全篇著作緣起、背景者，人多稱為〈小序〉。<sup>17</sup>

傳統《尚書》文本以〈尚書序〉出自孔安國之手，對此，楊簡未曾進行任何考辨，一切依循舊說，如其於〈王德高墓銘〉末註云：「……孔安國作〈尚書序〉，不出名里。王肅作《家語·序》，不出名里。」<sup>18</sup>〈尚書序〉言「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sup>19</sup>楊簡責以「孔安國不知道，裂而殊之，故以『三墳』為大道，『五典』為常道」，<sup>20</sup>可知其仍以〈大序〉為孔安國所作，但不會囿於作者在歷史上的地位而屈就其內容，且若〈大序〉內容不合其意，楊簡的批評顯得相當直接。

---

頁 243-244；陳良中：〈朱子與蔡沈《書》學異同考論〉，《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3 期（2010 年 6 月），頁 75-81。

<sup>17</sup> 詳李振興：〈尚書大、小序辨疑〉，《尚書流行及大義探討》（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 年），頁 77；程元敏：〈《書序》稱名〉，《書序通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 年），頁 12-13；葉國良：〈《書序》的異名與寫作時代〉，收入葉國良、李隆獻：《羣經概說》（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 年），頁 63-64。

<sup>18</sup> 宋·楊簡著，明·周廣輯：《慈湖遺書續集》，收入張壽鏞輯刊：《四明叢書》第 1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卷 1，頁 474：35b。

<sup>19</sup>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1 年），卷 1，頁 4。案：《尚書正義》前 10 卷收於李氏主編本第 3 冊，11 卷之後在第 4 冊，以下相關註解不一一標明冊數。

<sup>20</sup> 宋·楊簡：《慈湖遺書·家記二·論書》，收入張壽鏞輯刊：《四明叢書》第 1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卷 8，頁 292：39b。

《尚書》學史上所謂的《書序》乃是指各篇〈小序〉而言。司馬遷（約 145-86B.C.）並未明確提到《書序》的作者，只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sup>21</sup>「序《書傳》」當係指編定《書傳》之篇次，而非創制各篇〈小序〉。<sup>22</sup>東漢班固（32-92）《漢書·藝文志》則云：「《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sup>23</sup>班固是著名史官，其明言孔子作《書序》，序百篇之作意，<sup>24</sup>對百篇《書序》出自聖人之手之說，必然有推助之作用。<sup>25</sup>其後，馬融（79-166）、鄭玄（127-200）、王肅（195-256）皆言《書序》為孔子作。<sup>26</sup>

楊簡不能完全肯定《尚書》各篇〈小序〉之作者，但曾推測是孔安國所作，非出自孔子之手。<sup>27</sup>無論《書序》出於何人之手，楊簡在解經之時，仍依《序》文以解經，如以〈康誥〉為成王書，故解「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句云：

- <sup>21</sup>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卷47，頁1935-1936。
- <sup>22</sup> 案：如同程元敏之論，史遷所云之「序」當為「編次其事」，非班固所述「序其作意」之意，程氏由此而明辯以《書序》為孔子所作，乃因《史記》發端之說。詳程元敏：《書序通考》，頁179-184。
- <sup>23</sup>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30，頁1706。
- <sup>24</sup> 一說在班固之前，劉歆已以為孔子作《書序》，如蔡沈注〈尚書序〉云：「至劉歆、班固始以為孔子所作。」又注《書序》云：「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宋·蔡沈著，宋·朱熹授旨，嚴文儒校點：《書集傳》，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等編：《朱子全書外編》第1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卷前，頁5；卷末，頁278。近人陳夢家云：「以《書序》為孔子所作，創自劉氏父子，馬、鄭、王述其義，一直到宋代才有人懷疑。」陳夢家：《尚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96。
- <sup>25</sup> 案：與固同時的王充，亦主孔子作《書序》。《論衡·須頌》：「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黃暉：「皮錫瑞曰：『今文亦作「文思」，或三家本異，不盡由後人改之。仲任以「欽明文思」以下為孔子所言，蓋指《書序》言之，漢人皆以《書序》為孔子作。今《書序》作「聰明文思」，而仲任云「欽明文思」者，或今文《書序》與古文《書序》之字不同也。』」漢·王充著，黃暉校釋：《論衡校釋》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20，頁847。
- <sup>26</sup> 孔穎達：「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2，頁26。
- <sup>27</sup> 楊簡：「自湯至武丁，總二十二世。自武丁至紂，九世。自湯至紂，通三十世，外丙、仲壬在其中。《書序》云：『成湯既歿，太甲元年。』《書序》雖出孔壁中，其孔氏所為，非孔子所為歟？《禮記》亦出壁中，多非孔子之言，此〈少間篇〉見《大戴禮記》，《大戴禮記》多不善屬辭，本多乃字，乃記者不善屬辭故也，今削之。」宋·楊簡：《先聖大訓·少間第三十八》，收入張壽鏞輯刊：《四明叢書》第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卷5，頁168：19a-19b。案：《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8，頁241。

周公以王命告，而其實皆周公之言，故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康叔，成王叔父。「孟」，長也，於諸侯為長。皋陶亦自稱「朕」，古者人臣常稱。康叔，周公之弟；封，名。<sup>28</sup>

以〈康誥〉之辭為周公所發，故可云「朕其弟」，且以康叔為周公之弟、成王之叔，未及武王，至於下文所提及之「寡兄」，楊簡認為「武王之為諸侯也，常自稱寡人，故周公稱之曰『寡兄』」。<sup>29</sup>此皆與〈序〉文「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遺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相合。

楊簡不僅信賴《書序》，且亦引之以考訂史實，如〈洛誥〉經文「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sup>30</sup>楊簡考辨古時未有「王城」、「成周」之分，其云：

《書序》云：「成王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觀《書序》及《書》，未見王城、成周之為二。左氏乃有王城、成周之殊。孔子作經，必不如左氏之數更其辭以為文而已。蓋周初灋水東西皆曰「成周」，至春秋時始分灋西之城曰「王城」、灋東之城曰「成周」。<sup>31</sup>

<sup>28</sup> 宋·楊簡：《五誥解》，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頁603：2a。

<sup>29</sup> 宋·楊簡：《五誥解》，卷1，頁603：3a。宋代疑《書序》以朱子、蔡沈一派表現最突出。朱子以〈康誥〉三篇為武王書，其以經文「朕弟」、「寡兄」之語斷為武王自告康叔之辭；以武王，周公、康叔應同叫作兄。豈有叫武王為「寡兄」以告其弟之理。「寡」者，是向人稱我家、我國長上之辭也；以書文不該多稱文王而不及武王；以為《書序》乃被〈康誥〉首簡所誤，「只被其中有『作新大邑于周』數句，遂牽引得《序》來作成王時書，不知此是脫簡。」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5冊，卷79，頁2054-2055。

<sup>30</sup>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15，頁478。

<sup>31</sup> 宋·楊簡：《五誥解》，卷1，頁621：3a-3b。案：〈召誥·序〉原文作：「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以王命誥」之「誥」，〈多士·序〉原文作「告」。此外，楊簡於〈家記二·論書〉中亦辨及「成周與王城非異」之問題：「若夫『卜灋水東，亦惟洛食』者，見龜所食墨，亦依洛邑之吉爾，『亦』之一言，明非二事。王於是拜手稽首以謝周公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未嘗及別為下都以遷殷頑民之意。〈多士·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多士〉亦言『于新邑洛』，又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畢命〉亦曰：『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則洛邑即成周，豈不益明？合〈召誥〉、〈洛誥〉、〈多士〉、〈君陳〉、〈畢命〉五篇之〈序〉讀之，情狀昭昭。」於此則又增以〈君陳〉、〈畢命〉之序為證。宋·楊簡：《慈湖遺書》，卷8，頁289：33b-290：34a。

在此，楊簡列舉〈召誥〉、〈洛誥〉、〈多士〉等篇的序文，指出西周初年營建之洛邑即為成周，《左傳》有「王城」、「成周」之異名者，乃其「數更其辭以為文」之書寫風格所致。楊簡之論古時未有「王城」、「成周」之分，主要是透過《書序》及《書》之內容而統觀，而在「觀《書序》及《書》」之後又云「孔子作經」，依文意判斷，此處所謂「經」有可能包含序文，<sup>32</sup>若是則其對《書序》為孔子所作之傳統之說雖曾致疑，但仍無定見，而若其所謂「孔子作經」，實不涵蓋《書序》，則如前所言，楊簡以各篇〈小序〉出自孔安國之手，但《序》所言與《書》之經文同樣可信。

甚至，在解釋詩篇時，楊簡也能利用《書序》來幫助理解詩義，例如其解〈豳風·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之句，云：「《毛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孔安國亦以管、蔡、商為三監。案，《周禮》太宰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王啟監，厥亂為民。』《書序》曰：『成王東征淮夷，遂踐奄。』成王歸自奄，然則所謂淮夷者，奄也。」<sup>33</sup>不僅如此，楊簡在《先聖大訓》中更多處引《書序》以協助說理、考證，例如其云：「禹薦益於天，湯未必不授伊尹，武王未必不授周公，蜀先主尚能屬之諸葛孔明，而況於三代之英乎！《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不曰夏王啟，其以不能遜于益，而致有扈之戰，故貶歟！」<sup>34</sup>《書序》不特別指明啟的身份，是否具有特別之意，難以確定，楊簡則斷定此中自有微言大義。<sup>35</sup>又如在論及三年之喪時，楊簡曰：「鄭謂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作〈費誓〉。及攷《書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是伯禽始受封之國之時也，時周公未薨。《論語》云：『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是伯禽已就國臨臣民。《史記》云：『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然則伯禽卒哭而親金革，未必作〈費誓〉之時，康成之言亦難遽信，

<sup>32</sup> 學者亦有將《書序》視為《書》「經」、《尚書》「經」，自東漢許慎到宋代劉敞、蘇軾、程頤等人，都是以「經」稱或視《書序》。詳程元敏：《書序通考》，頁15-16。

<sup>33</sup> 宋·楊簡：《慈湖詩傳》，收入張壽鏞輯刊：《四明叢書》第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卷10，頁690：24a。案：楊簡所引第一處《書序》為〈大誥·序〉，原文作：「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其引《書》「王啟監」二句，出自〈梓材〉，其後之《書序》與〈梓材〉無關，而是「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分見（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13，頁403；卷17，頁535。

<sup>34</sup> 宋·楊簡：《先聖大訓》，卷1，頁9：2b。案：《書序》原文為：「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sup>35</sup> 案：楊簡重視《書序》之解〈甘誓〉，其於「啟在當時往往固辭，辭不獲而後嗣位，則啟之繼即唐虞之禪也」下云：「至于有扈氏不服啟，不遜於有德，不遜于益，而往伐戰于甘，孔子於此亦不與啟，其作《書序》，著其情焉。湯未必不以與伊尹，伊尹以太甲悔過而復君之，伊尹義當立太甲，則商之繼即唐虞之禪也。自餘不能讓于有德，繼世少肖，生民被其禍，則與唐虞之義不同矣。」宋·楊簡：《先聖大訓》，卷4，頁128：23a。



王肅謂伯禽有母之喪，不言作〈費誓〉，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sup>36</sup>三年之喪或許是三代「天下之通喪」，<sup>37</sup>但在先秦時代常見有彈性服喪者，子夏就以所發現之「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而問孔子「禮與？初有司與？」孔子答以：「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在子夏進一步問：「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之時，孔子則云：「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sup>38</sup>由於鄭玄以為徐戎作難，伯禽服喪卒哭而征之，作〈費誓〉，楊簡乃透過《書序》、《論語》、《史記》之記載，推翻鄭氏之說，而以《書序》為主要的論證來源，可見其對《書序》之看重。

## （二）《詩序》

楊簡對於《書序》抱持尊重的基本態度，並不表示他也可以善意對待《詩序》。

傳統對於《詩序》出自何人之手，顯得異說紛呈。最早言及《詩序》作者的是鄭玄，陸德明《經典釋文》在「〈關雎〉，后妃之德也」下云：「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sup>39</sup>《詩譜》已亡佚不全，但謂子夏作〈大序〉又介入〈小序〉，已讓傳統讀者不敢輕忽《詩序》的神聖性，蓋對經學家來說，《詩序》來自子夏的判斷已經足夠，因為子夏是孔子傳文學一科最具代表性的門人，<sup>40</sup>如《詩序》真出子夏之手，<sup>41</sup>則在傳承意義上來說，《詩序》已

<sup>36</sup> 宋·楊簡：《先聖大訓》，卷2，頁63：28b-29a。案：楊簡所引《史記》出自〈魯周公世家〉，原文作：「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所引《論語》出自〈微子〉，原文作：「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分見漢·司馬遷：《史記》第5冊，卷33，頁1524；宋·朱熹：《論語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9，頁187。

<sup>37</sup> 《論語·陽貨》記載，孔子回應宰我質疑三年之喪，以為「期已久矣」，云：「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宋·朱熹：《論語集注·陽貨》，卷17，頁181；《中庸章句》，頁26。

<sup>38</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曾子問》，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5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卷19，頁385-386。

<sup>39</sup> 唐·陸德明著，黃坤堯校訂，鄧仕樑、黃坤堯索引：〈毛詩音義上〉，《新校索引經典釋文》上冊（臺北：學海出版社，1988年），卷5，頁53：1b。

<sup>40</sup> 《論語·先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宋·朱熹：《論語集注》，卷6，頁123。

<sup>41</sup> 就早期文獻所載與情理而言，正如程元敏所說：「夫孔子編定《詩》教本，以授子夏，必併《詩》旨授之。子夏既受，亦併《詩》本文及《詩》旨授孔門後學，遞傳至毛公，大體完成今本《毛詩序》。」

具有成分相當高的聖人之意。

陸璣（三國吳學者，字元恪，生卒年不詳）在講述《毛詩》的傳授源流時，言及衛宏（生卒年不詳，活躍於東漢光武帝時代〔25-57〕）作《毛詩序》，范曄（398-445）之見解與之相同。<sup>42</sup>陸德明在引出《詩譜》之論《詩序》作者時，雖對衛宏作〈小序〉之說不能不提及，<sup>43</sup>但在其心中，子夏才是《詩序》的作者。<sup>44</sup>《隋書·經籍志》在述及《詩序》作者問題時，將子夏、毛公、衛宏都列為參與者，其云：「……是為『《毛詩》古學』，而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sup>45</sup>《隋書》出自魏徵（580-643）等人之手，又是官方所編纂的正史，其將《毛詩序》的所有權歸到子夏，毛公與衛宏同屬潤益者，可稱之為一種綜合、調停型的論述。至於奉敕編纂《五經正義》的孔穎達在論及孔子刪詩問題時，云：「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為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在反駁晉初孫毓（生卒年不詳，西元 265 年前後在世）質疑〈齊風·雞鳴·序〉時，孔氏亦云：「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謚未亡，若有別責餘君，作《敘》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斥言乎？」<sup>46</sup>此說較諸《隋書》顯得明確篤定，但都可視為唐代官方願意接受的意見。

在楊簡看來，衛宏就是《詩序》的作者，他直接指出：「《東漢書》謂衛宏作《毛詩序》。夫不聞子夏為書，而毛公始有《傳》，衛宏又成其義，而謂之《序》。蓋子夏親近聖人，無敢支離。毛公、衛宏益差益遠，使聖人大旨沉沒於雲氣塵埃之中，吁其甚矣。」<sup>47</sup>《詩序》

恐毛公之後，又有經師增益。」程元敏：《先秦經學史》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 年），頁 228。

<sup>42</sup> 分詳吳·陸璣著，清·丁晏校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叢書集成初編》影印《古經解彙函》本），卷下，頁 70；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儒林列傳〉，《後漢書》第 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卷 79 下，頁 2575。

<sup>43</sup> 陸德明：「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唐·陸德明著，黃坤堯校訂，鄧仕樑、黃坤堯索引：〈毛詩音義上〉，《新校索引經典釋文》上冊，卷 5，頁 53：1b。

<sup>44</sup> 《毛詩序》針對所有詩篇進行解題的工作，包括有題無詩的〈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僅有篇題，而無詩文：《詩序》依然可以解出其義，那是因為《詩序》認為此六詩雖「亡其辭」，但仍「有其義」。陸德明謂〈南陔〉、〈白華〉、〈華黍〉：「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唐·陸德明著，黃坤堯校訂，鄧仕樑、黃坤堯索引：《新校索引經典釋文》上冊，卷 6，頁 76：12b。

<sup>45</sup> 唐·魏徵等：《隋書》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 32，頁 918。

<sup>46</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1 年），卷 5 之 1，頁 383。

<sup>47</sup> 宋·楊簡：《慈湖詩傳》，卷 1，頁 575：4b-576：5a。

出自何人之手，是一個聚訟難決的問題，楊簡接受《後漢書》之說，以為衛宏作《毛詩序》，這其中並無嚴謹的推論過程，但楊簡依然對自己的判斷極有自信，他在解釋〈周南·樛木〉主題時說：「《毛詩序》差誤既多既甚，理難盡信，今觀是詩，殊無后妃之狀，惟言君子爾。《毛詩傳》亦未嘗言后妃，亦未嘗言不妒忌，獨為《序》者始立其說，曰后妃不妒忌，鄭《箋》又從而和之，故諸儒從其後，而不可告語矣。學者觀書，奚可雷同，不復考察？至是益信《東漢書》謂衛宏作《毛詩序》，果明驗矣。」<sup>48</sup>在楊簡看來，「《毛詩序》差誤既多既甚」，所以他深信《後漢書》的記載，但何以《毛詩序》表現不佳，就必然是衛宏所作，則楊簡未曾進一步解釋這個問題。

既然以為《詩序》出自衛宏之手，就已無特殊的神聖性可言，楊簡也就不將之錄入《慈湖詩傳》中，何況讓其讀者合觀詩文與序文，可能也不利於其心學的講述與傳播。所以，楊簡在講論詩義的過程中，若徵引《詩序》之說，其用意主要是在駁斥、推翻其內容，甚至，其批判《詩序》措辭之激烈，已在王質（1135-1189）之上，這一部分，總數大約有112篇之多。<sup>49</sup>

就解釋內容所蘊含的道德性觀之，《詩序》畢竟屬於儒家系統之作，所以楊簡揆擊《詩序》的焦點與此無關，而是在其發現《詩序》有詮釋過度的現象，其解題並不符合詩意本旨。如〈芣苢〉之〈序〉將詩旨解為「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也」，<sup>50</sup>楊簡以為本詩說的是「庸常日用皆道」的道理，《詩序》「推求」詩旨太過，成為累贅鋪演之說。<sup>51</sup>又如《詩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sup>52</sup>楊簡的解釋角度依然從心入手：

此不敢犯禮之心，即正心，亦道心，亦天地鬼神之心。彼不知道者必以為粗近之心，非精微之心。吾則曰：「此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知此者奚止千無一、萬無一，無惑乎為《序》者不足於此而推於

<sup>48</sup> 宋·楊簡：《慈湖詩傳》，卷1，頁579：12b-580：13a。

<sup>49</sup> 洪湛侯：「歷來談到南宋的反《序》派，一般都標舉鄭樵、王質和朱熹，其實與朱熹同時代的楊簡，也是一個堅決反對《詩序》的學者，他攻擊《詩序》的言論，即使未逮鄭、朱，但已遠遠超過王質。」洪湛侯：《詩經學史》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345。又，楊簡駁斥《詩序》的112篇中，〈國風〉有63篇，〈小雅〉30篇，〈大雅〉8篇，三〈頌〉11篇。

<sup>50</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1之3，頁61。

<sup>51</sup> 楊簡：「人感於物而為言為音，無非道者。惟流而入於邪，則昏則迷。〈芣苢〉無邪之詩也，無邪則無往而非道。先儒不知道，顧於坦夷無說之中，外起意說。必推及於后妃之和平，和平則婦人樂有子，雖非邪言，實失本旨。」《慈湖詩傳》，卷1，頁583：19a。

<sup>52</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第5冊，卷1之3，頁63。

文王也！

依楊簡之意，「下學」為粗近、不敢犯禮之心，上達指道心、天地鬼神之心。下學而上達者，不敢犯禮即不思不勉之道心。此心人人具有，不必推於文王之教化。這正是以本心來批評《詩序》外來教化之論，實為心學最重要的立場。於是，楊簡又批評《詩序》：「其為言非不善，惟不明乎道，不明乎是詩之道心，而贅為說焉，則亦足以亂人之道心，故不可用。知夫〈關雎〉太姒之詩，而不言太姒，惟曰后妃之德，則〈漢廣〉不必推文王矣。」<sup>53</sup>批評的重心在於《詩序》作者不明心之理，所作的歧出之解釋不僅使詩的意旨產生偏差，也因而惑亂了人本有之道心。

楊簡常用「外推」、「外求」、「旁推」、「旁求」這樣的用語批評《詩序》詮釋過度，這一部分在今本《慈湖詩傳》中計有 31 篇，<sup>54</sup>而就其批評之內容來看，楊簡主要是發現《詩序》不能從自己的本心去尋求詩意，故其解釋往往遠離了「道」，如此也就與真實的詩義相去甚遠。雖然《詩序》的詮釋本來就是針對詩的言外之意而發，但楊簡批判《詩序》充滿了「外推」、「外求」詩義之弊，並非在指責《詩序》不尊重原詩直簡明確的言內之意，而是針對其偏向從「本心」之「外」去尋求詩義，這樣的解詩方向既已發生偏差，則解釋過程也只能旁趨他求，而最終的解題結果當然也就支離冗雜，遠離了經典所蘊含的「道」，從而也就可以證明《詩序》作者的原本就不知「道」。楊簡如此批評《詩序》，與他慣用的以「一」統「萬」，以「一」融攝「萬」理、「萬」德的思想有關，<sup>55</sup>所以他說：「嗚呼！三百篇一旨也，有能達是，則至正至善之心，人所自有，喜怒哀樂無所不通，而非放逸邪僻，是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sup>56</sup>從道德修養的角度來說，楊簡所提的工夫次第顯得極為簡單而直捷，以「一」或「心」來涵攝萬理、萬物，如此，明道不難，求道也不難，求諸此心，明本心、去意蔽即可，這種以「求本心」作為修養德行的工夫，一直都是心學家的共同主張，將之用在經典的研習上，當然會呈現與傳統不同的風味。事實上，只要認定《詩經》各篇之創作旨在闡發人的至正至善之心，楊簡檢視傳統解《詩》的標準

<sup>53</sup> 宋·楊簡：《慈湖詩傳》，卷 1，頁 584：21a-21b。

<sup>54</sup> 三十一篇包括：〈周南·關雎〉、〈葛覃〉、〈蟋蟀〉、〈桃夭〉、〈采芣〉、〈漢廣〉、〈汝墳〉、〈召南·鵲巢〉、〈采芣〉、〈草蟲〉、〈甘棠〉、〈行露〉、〈羔羊〉、〈衛風·考槃〉、〈王風·黍離〉、〈君子陽陽〉、〈采芣〉、〈鄭風·叔于田〉、〈齊風·著〉、〈東方之日〉、〈盧令〉、〈魏風·十畝之間〉、〈唐風·葛生〉、〈秦風·小戎〉、〈小雅·天保〉、〈魚麗〉、〈吉日〉、〈黃鳥〉、〈谷風〉、〈漸漸之石〉、〈周頌·天作〉。

<sup>55</sup> 詳李承貴、賴虹：〈論楊簡的儒學觀〉，《南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8 卷第 1 期（1997 年 3 月），頁 10-13。

<sup>56</sup> 宋·楊簡：《慈湖詩傳》，卷 3，頁 596：4a。

也就會集中在這個層面，而傳統的讀《詩》視域必然不能符合楊簡所需，自作全新的《詩傳》也就成為必然的結果了，這樣的釋《詩》態度容易遭到後人批判是絕對可以想見的。<sup>57</sup>

### 三、袁燮對《書序》與《詩序》的態度

#### （一）《書序》

袁燮對於舊題孔安國撰的〈尚書序〉一文未見興致，《絜齋家塾書鈔》不引其文，也不對作者問題進行考辨，此外，袁燮雖然相信《尚書》舊《傳》出自孔安國之手，但《絜齋家塾書鈔》對孔《傳》並不重用，全書僅一處稱許之。<sup>58</sup>最重要的是，漢代以來，百篇《書序》與《尚書》之編集皆出自孔子之手之說成為主流，宋代開始出現反對的聲浪，<sup>59</sup>袁燮則不受新說影響，依然認定孔子作百篇《書序》，對於百篇《書序》的來歷與價值，袁燮不惟接受傳統意見，且願意疏解《書序》。如《書序》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袁燮曰：「孔子序《書》，下一『難』字，見其眾人所謂難者皆做了，則其易者可見矣。」<sup>60</sup>又如袁氏以為，〈舜典〉記載舜帝巡守、朝覲、用刑等事，並非堯時無此制，乃因至舜時而始備，故載於〈舜典〉。<sup>61</sup>此外，《書序》云：

<sup>57</sup> 葉文舉以為，楊簡從心學出發以反對《毛詩序》，本身即有理論先行、本末倒置的危險，而其新解也帶有嚴重的隨意性，這是「六經注我」帶來的普遍性弊病。詳葉文舉：〈「詩之有《序》，如日月之有雲，如鑿之有塵」——從心學內涵論楊簡廢《序》的思想成因〉，《詩經研究叢刊》第27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年），頁440-441。

<sup>58</sup> 袁燮：「……《書》惟孔安國，《詩》惟毛、鄭，《禮》惟戴氏而已，餘皆散亡磨滅，百不二三存焉。」宋·袁燮：《絜齋集·經生家學》，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6，頁66：30a。《尚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傳》：「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孔安國註以為復還明君之政，此語甚好。」分見（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15，頁477。宋·袁燮：《絜齋家塾書鈔》，收入張壽鏞輯刊：《四明叢書》第2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卷11，頁317：28a。

<sup>59</sup> 清儒朱彝尊整理《書序》作者之說云：「說《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程顥、董誥諸儒是也。謂歷代史官轉相授受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論謂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由是九峰蔡氏作《書傳》，從而去之。」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59，頁303：2b-304：3a。

<sup>60</sup> 宋·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卷1，頁97：15b。

<sup>61</sup> 詳宋·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卷1，頁104：29b。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袁燮詳細解析「矢」、「成」、「申」三字之差異，並云：「欲觀帝舜申之處，合三篇觀之便可見。〈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直至終篇，猶是臯陶賡歌，此可見其申之處。三篇本合而為一，所以孔子序《書》，將此二句并敘三篇到底，方才見得，當子細看箇『申』字。」<sup>62</sup>而「禹貢」之名篇，亦是貢賦制度至禹時而完備，<sup>63</sup>《書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袁燮認為：「孔子序《書》，將『任土』二字斷禹之制，蓋此二字惟禹足以當之。」<sup>64</sup>由於認定《書序》作者為孔子，故袁燮不排除《書序》之內容寓有《春秋》筆意。如〈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經文卻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序〉稱十一年，但經文卻稱十三年，袁燮則斷定應以觀兵於十一年之說為是：

伐紂雖在十三年，然當其觀兵之時，伐商之心蓋始於此，所以孔子定為十一年，《春秋》之法也。「一月戊午」，此即十三年之一月。孔子書法甚嚴，觀書「一月」便可見。不曰「正月」，而曰「一月」，「正」者，正也。是時無王不得為正，故不稱正，而稱一。其嚴如此，則十有一年豈得不嚴乎？<sup>65</sup>

武王伐商之「心」固非心學家所謂的本心，但既認定此心始於武王觀兵之時，於是袁燮研判，《書序》之定為十一年，正是孔子作《春秋》之法，而伐紂實為發生於十三年之事，故「一月戊午」乃指十三年之一月，至於不稱「正月」，乃因此時無王。

在袁燮看來，孔子序《書》嚴正分明，用句遣詞亦自有深意，故面對〈旅獒·序〉謂「西旅獻獒」，經文則云「西旅底貢厥獒」，袁燮的解釋是：

《書》言「西旅底貢厥獒」，而孔子序《書》，筆之曰「獻」，蓋所謂「貢」者，如〈禹貢〉所言貢賦皆服食器用有用之物，獒豈用物乎？非用物而貢之，是遠夷以

<sup>62</sup> 詳宋·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卷2，頁116：2a。

<sup>63</sup> 袁燮：「孔子序《書》斷自唐虞，則貢賦之法在唐虞時亦必有之矣，然獨至禹而以『貢』名篇者，其法至此始大備焉故也。」宋·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卷4，頁164：3a。

<sup>64</sup> 《絜齋家塾書鈔》，卷4，頁174：23a。案：《書序》言禹「任土作貢」，袁燮解為「因其土地之所宜，制為貢賦之法，無者不使有，有者不使無」。宋·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卷4，頁163：1b。

<sup>65</sup> 宋·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卷8，頁246：1b。

此媚中國也。故聖人易「貢」為「獻」，其意深矣。<sup>66</sup>

「貢」與「獻」一字之異，或許無足為道，但依照袁燮的解讀，此中卻蘊有聖人深意，其對孔子創作《書序》之傳統論點的支持，由此可見一斑。

既以孔子為《書序》作者，袁燮也因此依《序》解經，如《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史遷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為在位年數，<sup>67</sup>然袁燮則以為外丙、仲壬年幼未立，二年、四年為二人之歲數。<sup>68</sup>解〈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段，則據《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之言，斷此篇乃周公奉成王之命，以告康叔治國之道，而非武王告康叔之書。<sup>69</sup>另外，或謂〈多士〉失次，當在〈洛誥〉之前，袁燮則據《書序》斷其是非，以〈多士·序〉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雖與〈召誥〉所云「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看似相悖，然而「〈召誥〉所謂『庶殷』，蓋經始洛邑之時，所謂發從役者爾，是時未曾遷也。其實，遷民之時，在洛邑一發既成之後」。<sup>70</sup>周既得天下，則商人皆得為其所役使，故調而營洛邑，待都邑建成，才盡遷其民；此為周公營洛之次序，故〈多士〉、〈洛誥〉之編帙並未淆亂。在解釋〈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至「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之段時，袁燮先接受《書序》之說，云：「遷頑民於新邑，作書以告之。」又恐「頑民」之詞下語過重，故先強調「孔子序《書》，謂之頑民者，言其不知天命也」，接著從「人心」的角度入手做出調停之說：「周公不敢以民視之，而待之以士，蓋其涵濡商家數百年，深仁厚澤，入于骨髓，豈肯一旦臣服於周，所以常以報復為心，雖不知天命，其心蓋甚忠義矣。既是忠義，非士而何？夫其心在忠義，這箇最難調停，所以周公先破其疑，謂非我有心於取商之天下也。天歸之民歸之，吾不得已起而受之，何嘗有

<sup>66</sup> 宋·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卷10，頁279：1a。

<sup>67</sup> 司馬遷：「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適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適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漢·司馬遷：《殷本紀》，《史記》第1冊，卷3，頁98。

<sup>68</sup> 袁燮：「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嫡孫也。太丁未立而死，仲壬、外丙，其年尚幼，故二人不立，而立太甲，所謂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特歲數爾，二人寔未嘗立也，天下正統當傳于嫡。」宋·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卷5，頁188：8a。

<sup>69</sup> 袁燮云：「此書，周公奉成王之命以告康叔也。曰王者，謂成王也。曰『孟侯，朕其弟』者，周公自言也。成王於康叔當稱為叔父，今周公奉王命以告而稱弟，蓋雖出於王命，然周公自言却無緣以叔父稱也。以人情觀之，可見矣。」宋·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卷10，頁292：28b。

<sup>70</sup> 宋·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卷12，頁324：1a-1b。

一毫私心哉？」<sup>71</sup>由此可知袁燮信服《書序》，願取之為證，並為之回護。這種為《書序》辯解的例子亦出現在袁燮面對〈召誥〉「大保乃以庶邦冢君」一段的解釋上，<sup>72</sup>可見在袁氏心目中，《書序》是不容輕易挑戰的。

## （二）《詩序》

不同於楊簡之否決、批判《詩序》，袁燮對於《詩序》如同其面對《書序》一般的尊重，而且，比起《絜齋家塾書鈔》，《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對於傳統的解經更見支持。

楊簡認定《詩序》出於衛宏之手，故其批評可以沒有特別的心理負擔，袁燮則未曾提到《詩序》的作者，但他在〈詩序一〉中開宗即引〈詩大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的一段話，而引申之曰：「臣觀先王盛時，禮樂教化薰蒸陶冶，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發而為詩，莫非性情之正，流風遺俗，久而不泯，雖更乎衰世，而氣脈猶存，此變〈風〉之作所以皆止于禮義，而歸諸先王之澤也。」此處有肯定外來教化之意，但袁燮接著又將之與孔子「思無邪」之言、孟子性善之論連言，並云：「〈大序〉所謂禮義，即孔子所謂無邪也。詩人作之，以風其上；太師采之，以獻諸朝，以警君心，以觀民風，以察世變。一言一句皆有補于治道，人君篤信力行，則可以立天下風化之本；公卿大夫精思熟講，則可以感人君心術之微；《詩》之功用如此。」<sup>73</sup>此處既重視《詩序》之論，又利用機會將義理歸諸民心。此外，根據上述之語，我們若由此而說，袁燮以為透過太師的采詩與國史的編纂、作《序》，這才有了後世完整的《詩》三百文本，應該不是不可能的推測。

袁燮對〈詩大序〉的肯定不僅如此。〈大序〉以〈國風〉、大小〈雅〉、〈頌〉為四始，

<sup>71</sup> 宋·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卷12，頁325：3a-3b。

<sup>72</sup> 〈召誥〉：「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般，越自乃御事。』」袁燮：「此一段諸儒之說多不同，東萊以為周公欲歸，召公取天下諸侯贄見幣物，獻之周公，與召公之戒，一併轉達于王；其說信美矣，然以禮觀之，亦恐未必然。此只是成王曾來洛，召公面陳此戒，謂營洛大事也，召公既先相宅，周公又達觀于新邑營，其後成王又必來看一次，不應國家舉此大事，而王者不親來觀。東萊之意，蓋謂序《書》只言成王在豐，使召公先相宅，不曾在洛；然不可如此論，當時孔子序《書》，豈能一一具載？亦只舉其大綱爾。且如〈仲虺之誥·序〉不過曰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未嘗說成湯有慙德也，若無此篇書，何以知因有慙德而作？只以〈洛誥〉觀之，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序》只以為使來告卜爾，然自『王拜手稽首』以下，皆周公成王面相答問之言，《序》亦何嘗及此哉！」宋·袁燮：《絜齋家塾書鈔》，卷11，頁310：14b-311：15a。

<sup>73</sup> 宋·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收入張壽鏞輯刊：《四明叢書》第1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卷1，頁11：2a。



《史記·孔子世家》以〈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他認為《史記》與〈大序〉所言若不相合，但兩者可以融通，蓋「〈國風〉、〈雅〉、〈頌〉為三百五篇之綱領，而〈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為〈國風〉、〈雅〉、〈頌〉之綱領歟！皆羣言之首也，故謂之始」。在肯定〈詩大序〉價值的時候，他又對君主施以機會教育，並以期勉之語曰：「有德斯有功，以《大學》觀之，心正、意誠，德也。治國、平天下，功也。本末一貫，非有二致，而後世止以戡難為功德，不足者亦能底一時之績，于是乎判為兩途，失其指矣。〈大序〉合而言之，其知道之言乎！嗚呼！王道之盛也，〈雅〉在王朝，而侯國不得有〈頌〉，及其衰也，平王降為〈國風〉，而魯人頌僖公之美，世變之推移如此，甚可畏也。人主觀此，盍亦知所警矣！」<sup>74</sup>比較起楊簡心目中《詩序》無大小之分，且批評〈關雎序〉所言不合詩意，<sup>75</sup>可知同屬陸門心學家，楊、袁二氏的《詩序》價值觀迥不相同。

作為經筵講義體的《黎齋毛詩經筵講義》，其最早的讀者乃是當朝統治者，故在宣講詩篇大義時，不能僅侷限於心學層面，政策的引導亦極為重要，而由於《詩序》本就善於從政治的角度解說詩旨，故袁燮說《詩》沿用《詩序》的意見，再視情況注入其心學主張，也可謂順理成章的結果。舉例而言，《詩序》解〈谷風〉為：「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sup>76</sup>此說與《爾雅》云「東風謂之谷風」，在楊簡看來都是「於義未安」的，<sup>77</sup>袁燮宣講此篇大義，卻願意重視《序》說，其云：「臣聞所貴乎君子者，無他事焉，惟不失其本心而已。人生而善，天之性也，有正而無邪，有誠而無偽，有厚而無薄，有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所謂本心也。其始如是，其終亦如是，雖歷年之久，不變乎其初，所謂不失也。今觀此詩，何其人情前後之不類歟！……故序《詩》者以為衛人化其上，宣公之罪不可掩矣。由是觀之，為人主者，可不正其本哉！」<sup>78</sup>肯定《詩序》之論，又與「不失其本心」、「正其本」連結，這是袁燮說詩之巧妙。再如《詩序》：「〈采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袁燮云：

<sup>74</sup> 宋·袁燮：《黎齋毛詩經筵講義》，卷1，頁11：2b-12：4a。

<sup>75</sup> 楊簡批評《毛詩序》：「委曲遷就，意度穿鑿，殊可歎笑。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關雎〉之音也，非言〈關雎〉之詩也。為《序》者不得其說，而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今取〈關雎〉之詩讀之，殊無『哀窈窕，無傷善之心』之意。」宋·楊簡：《慈湖遺書》，卷8，頁294：43a-43b。

<sup>76</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2之2，頁171。

<sup>77</sup> 宋·楊簡：《慈湖詩傳》，卷3，頁601：13b-14a。

<sup>78</sup> 宋·袁燮：《黎齋毛詩經筵講義》，卷3，頁27：2b-28：3b。

臣聞《易》之〈咸〉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人心至于和平，則風俗粹美，不可以有加矣。無以感之，豈能臻此哉？然則何以感之？曰行遠自邇始，治外自內始，未有其家不可教，而能化行于他人者，故宮闈之遠，風化之樞機也。后妃無妒忌之行，其心既和平矣，眾妾進御于君，不復顧慮，則其心亦和且平矣。夫和平者，人之本心也。宮闈之內至和至平，皆以有子為樂，則風化所覃，自近及遠，亦孰不以有子為樂哉！芣苢者，宜子之藥也。……詩人觀夫芣苢之采，既為之三詠三歎，而序《詩》者則蔽以一言，而曰后妃之美，蓋非后妃之賢，得其本心，則必不能使當時之婦人亦皆遂其本心也。尊卑上下皆不失其本心，可謂極盛之時矣，後之為妃者要當以是為法。<sup>79</sup>

《詩序》之解〈芣苢〉，如前所言，在楊簡看來「實失本旨」，袁燮卻認為《序》說無一字不可信，故願意從心學的角度證成其說，既收納了傳統的詩解，而又讓「人之本心」、「得其本心」、「遂其本心」、「不失其本心」充滿其間，從而構成了截然不同於楊簡的解《詩》內容。

就現存四卷本《毛詩經筵講義》之內容觀之，袁燮擅長利用《詩序》的倫理教化格調，再輔以「本心」解說詩文大意，所以其對詩歌主題之研判是尊重傳統的，但是詮釋內容與特色則為傳統所無。例如〈邶風·式微〉一詩，《詩序》解為「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之作，<sup>80</sup>袁燮完全同意此說，但與早期的尊《序》者不同的是，他從黎侯被外族人所逐而聯想到宋朝的情勢，因此起始便云：「臣聞人君有志則危弱可為安疆，苟惟無志，則終于危弱而不振。」緊接著舉太王迫於狄人，去邠至岐，終能成就王業；越王句踐不忘復仇，成就中興大業兩史例，並且意有所指地總結說：「（黎侯）誠能居患難之中，勵剛彊之志，朝夕思念，求反其國。懲創既往，改弦易轍，夫豈終不可為哉！」<sup>81</sup>暗示寧宗當效法太王、句踐，磨勵心志，如此必能有所作為，恢復宋朝。類似這種借題發揮，由詩文相關主題聯想到宋代國勢，尤其是北宋的滅亡與邊境強敵的脅迫、南宋危弱不安的現狀等，在《毛詩經筵講義》中為數不少，如《詩序》解〈王風·黍離〉為「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sup>82</sup>袁燮由此

<sup>79</sup> 詳宋·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1，頁15：11a-16：12b。

<sup>80</sup> 鄭《箋》：「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2之2，頁180-181。

<sup>81</sup> 宋·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3，頁26：4a-5a。

<sup>82</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4之1，頁297。

而想到北宋之亡與西周之滅同，但西周鎬京故都仍在境內，北宋國都汴京卻陷入敵人之手，欲如西周舊臣過境故都憑弔故國，已不可能。「此天地之大變，國家之大恥也」，末段並語重心長地勸誡寧宗：

平王惟不自彊，所以迄不能復西都之盛，聖主誠能反其所為，臥薪嘗膽，以復讎刷恥自期，則大勳之集指日可俟也。<sup>83</sup>

又如《詩序》解〈衛風·木瓜〉為「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sup>84</sup>袁燮接受此一解釋，並且由衛人厚報齊桓公救國之德而聯想到：當今金朝衰微無法抵抗強大的蒙古，部分宋人害怕蒙古對南宋造成更大的威脅，竟提議援助金朝。因此袁燮要求寧宗不可忘記金人滅宋之讎，絕不可給予任何援助。<sup>85</sup>再如《詩序》解〈衛風·芄蘭〉云：「〈芃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sup>86</sup>袁燮接受此論，利用進講此篇的機會向君主建言：「臣聞人君之德莫大于剛健，人君之患莫甚于柔弱。剛健則日進無疆，足以有為于當世，柔弱則安于苟且，不能少見于事業。智愚相去豈不遠哉！今一介之士，苟惟柔弱，則不能自立于鄉黨，況于國君，一舉一錯，安危所關，其可以柔弱自處乎？」<sup>87</sup>至如《詩序》解〈召南〉之〈小星〉、〈江有汜〉云：「〈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sup>88</sup>袁燮則云：「臣觀〈小星〉、〈江有汜〉二詩雖所遇不齊，然其以心感心則一也。〈小星〉之夫人無妒忌之行加惠于媵妾，故為妾者感之，安于定分而夫人之善益彰。〈江有汜〉之媵事忌克之嫡，雖勞而不怨，故為嫡者感之，感其前而非媵之美益顯，然則人心未有不可感發者。」<sup>89</sup>「區區媵女之微，惟能反求諸己而感格之效立見，此亦聖人在上，道化流行而當時風俗如此之美也。君天下者可不原其所自哉！」<sup>89</sup>袁燮根據《詩序》的說法，把〈江有汜〉解釋為媵女遭遇不平等的待遇，卻能勞而不怨，最終化改了夫人之心，使其悔悟。這種以下感

<sup>83</sup> 宋·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3，頁33：18a。

<sup>84</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3之3，頁289。

<sup>85</sup> 宋·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3，頁32：16b。

<sup>86</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3之3，頁279。

<sup>87</sup> 宋·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3，頁32：12b-33：13a。

<sup>88</sup> 分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1之5，頁110、114。

<sup>89</sup> 宋·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2，頁20：4a-21：5b。

上之崇高行為，乃為聖人教化所致，而以己感化他人的方式，依心學的基本見解，必然是先反求諸己，只有從自己做起，方能收到延伸、拓展的效果。透過以上這些例證可見，楊簡必須拋棄《詩序》，才方便自由闡述其心學主張，袁燮則因其《毛詩經筵講義》的特殊性質，故善於利用《詩序》重視政治歷史、倫理教化的特色，將之與其心學論調合而為一。

#### 四、結語

同出聖門的朱陸兩派之學術思想同中有異，異中有同。<sup>90</sup>就實際層面而言，沒有一位理學家不承認本心的重要性，面對政治高層，朱熹也曾透過注解經典名句的方式，而以「天下之大本」為核心主意，深為孝宗（1162-1189 在位）言之，<sup>91</sup>但朱門學者從事經典詮釋之事業，畢竟不會刻意凸顯心學之色彩，而且也會盡量以考據的態度、眼光來面對傳統，<sup>92</sup>只是，朱熹的治學精神與進路，也被陸九淵評為「學不見道，枉費精神」。

<sup>90</sup> 江永〈朱陸異同論〉：「朱子之學，主敬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省察力行以踐其實。此孔、顏相傳博文約禮之教，由下學而上達者也。陸子之學，惟務涵養本源，謂『學苟知道，則六經皆我註腳』，是其天資超妙，若聖門之狂簡，所見既高，則不屑屑於下學者也。說者謂朱子主『道問學』，陸子主『尊德性』，此亦非確論。朱子主敬力行，何嘗不尊德性哉？然則朱、陸之學皆無同者乎？不然，其反躬為己，孜孜於學聖人，則二子未嘗不同也。故朱子嘗言：『南渡以來，理會著實功夫可，惟某與子靜二人。』而於守南康時，陸子來訪於白鹿書院，請子靜講〈喻義喻利〉一章，聽者至於泣下。朱子謂：『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此可見其有同焉者矣。」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鍾彩鈞校訂：《善餘堂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年），頁5-6。案：「理會著實功夫可」句下，原註：朱子〈復包顯道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腳，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故「可」字疑當作「者」。

<sup>91</sup> 朱熹〈戊申封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臣謹按：《尚書》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別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得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難見耳。」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2冊（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卷11，頁366-367。

<sup>92</sup> 以《尚書》為例，朱熹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卻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於舜方止。今卻說是讓於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卻說『歷試諸艱』，是

<sup>93</sup>心學家處理經典的態度則不同，陸門學者視經典的最高作用為印證本心之道，心學之風味處處洋溢於其解經文本之中，傳統的解經方式與內容，若無助於讀者的反求、回諸本心，則不必接受傳統，甚至，為了掃除闡經的障礙，必須批判、揚棄傳統，但若傳統無害乃至有利於心學家的講釋經典，則依然必須給予傳統以一定程度的尊重。

既然陸九淵主張為學要能「見道」，則其門下解經當然對於傳統解經的是否「知道」相當在意，肯定、否定都從此一角度而來。舊謂〈尚書序〉出自孔安國之手，楊簡認同此一意見，但他對於〈序〉文之內容並不滿意，「孔安國不知道」之評語更是顯得相當直接。至於相傳出自孔子之手的各篇〈小序〉，楊簡曾推測亦為孔安國所作，但終無把握，雖然，在解經之時，楊簡依然信賴《書序》，依其內容以解經，畢竟，《書序》之內容僅在簡述各篇創作動機、背景，無關乎是否明道。在《詩經》學方面，《慈湖詩傳》對於代表傳統三百篇解題成果的《詩序》完全不能接受，主要是因楊簡認定《詩序》作者乃是漢儒衛宏，且又發現《詩序》不明白詩之道心，不能從自己的本心去尋求詩意，刻意推求詩旨的結果，反而使其解釋遠離了「道」，如此也就與真實的詩義相去甚遠。

同為陸九淵高足，袁燮對於傳統的解經成果較為重視，其對於舊題孔安國撰的〈尚書序〉以及舊有的《尚書孔傳》皆不見興致，那是因為《尚書》總論與訓詁的內容對其詮釋經典無法發揮作用，至於解題性質的《書序》與《詩序》情況自又不同。漢朝以來，百篇《書序》與《尚書》之編集皆出自孔子之手之說極為流行，宋代開始出現異論，袁燮則完全不受新說影響，依然認為孔子作百篇《書序》，不僅對於內容深信不疑，且不時在《絜齋家塾書鈔》中為之疏解，似乎推演《書序》也已成爲袁燮撰寫《家塾書鈔》的任務之一。在《詩經》學方面，袁燮說《詩》都沿用且發揮《詩序》的解題成果。有關《詩序》的作者問題，袁燮並未明確表示意見，但他在《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首〈詩序一〉中，起首即引述〈大序〉有關「國史」對三百篇之參與的一段文字，似乎是以爲《詩序》的完成與

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5冊，卷78，頁1985。以《詩經》為例，朱熹《詩序辨說》：云：「《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宋·朱熹：《詩序辨說》，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卷前，總頁353。

<sup>93</sup> 陸九淵：「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奈何？」〈語錄上〉，《陸九淵集》，卷34，頁414。

國史有所關連，而他採用《詩序》的理由就是其言「知道」。對於袁燮而言，三百篇本來就具有特殊的性質與功能，從創作、採集到運用皆源於教化，詩篇中的一言一句皆有補於治道，這一部分，《詩序》已經提供了可資信賴的成績。當然，袁燮重視在上者的教化作用，但是他也肯定唯有得其本心的在位者才能施教。

很明顯的，楊簡與袁燮對於傳統是否「知道」的判準並不相同，依筆者之見，《慈湖詩傳》與《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的解說對象差異太大，前者以心學說《詩》，本來就不必有任何顧慮，後者則必須在心學與政治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這應該是楊、袁二氏對於《詩序》或棄或取的關鍵之所在。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百篇《書序》早已殘缺不全，僅存的六十七篇《序》文，楊簡、袁燮都高度重視，而完整留存的三百篇《詩序》，楊簡棄若敝屣，袁燮視若至寶，對於傳統的解經成果，心學家似乎也是採取自主心證之態度的。<sup>94</sup>

---

<sup>94</sup> 案：有關楊簡、袁燮面對《書序》與《詩序》的異同態度，本文審查委員有一高見，特錄於此，以供高明讀者卓參：在《書序》方面，由於《尚書》本來就全屬政治內容，《書序》作者的地位雖會影響《書序》的權威性，作為政治與歷史解釋，總有可取之處，這是楊簡、袁燮都採用《書序》的原因。但《詩序》的情況不同，《詩序》對《詩經》進行政治與歷史解讀，並不符合宋代《詩經》學道德詮釋的主流，因此楊簡主張衛宏作（其用意在於廢〈小序〉），但袁燮因為經筵的政治性，而維持傳統說法，但也用賦予心學的解釋。

## 徵引文獻

### 古籍

- 漢·孔安國 Kong Anguo 傳，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尚書正義》*Shang Shu Zheng Yi*，收入李學勤 Li Xueqin 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Shi San Jing Zhu Shu Zheng Li Ben*（臺北 Tapei：臺灣古籍出版公司 Taiwan Guji，2001 年）。
- 漢·毛亨 Mao Heng 傳，漢·鄭玄 Zheng Xuan 箋，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毛詩正義》*Mao Shi Zheng Yi*，收入李學勤 Li Xueqin 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Shi San Jing Zhu Shu Zheng Li Ben*（臺北 Tapei：臺灣古籍出版公司 Taiwan Guji，2001 年）。
- 漢·司馬遷 Sima Qian 著，南朝宋·裴駟 Pei Yin 集解，唐·司馬貞 Sima Zhen 索隱，唐·張守節 Zhang Shoujie 正義：《史記》*Shi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63 年）。
- 漢·王充 Wang Chong 著，黃暉 Huang Hui 校釋：《論衡校釋》*Lun Heng Jiao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0 年）。
- 漢·班固 Ban Gu 著，唐·顏師古 Yan Shigu 注：《漢書》*Han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62 年）。
- 漢·鄭玄 Zheng Xuan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禮記正義》*Li Ji Zheng Yi*，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Chong Kan Song Ben Shi San Jing Zhu Shu Fu Jiao Kan Ji* 第 5 冊（臺北 Ta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76 年）。
- 吳·陸璣 Lu Ji 著，清·丁晏 Ding Yan 校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Mao Shi Cao Mu Niao Shou Chong Yu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5 年，《叢書集成初編》影印《古經解彙函》本）。
- 南朝宋·范曄 Fan Ye 著，唐·李賢 Li Xian 等注：《後漢書》*Hou Han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3 年）。
- 唐·陸德明 Lu Deming 著，黃坤堯 Huang Kunyao 校訂，鄧仕樑 Deng Shiliang、黃坤堯 Huang Kunyao 索引：《新校索引經典釋文》*Xin Jiao Suo Yin Jing Dian Shi Wen*（臺北 Tapei：學海出版社 Xue Hai Publishing House，1988 年）。
- 唐·魏徵 Wei Zheng 等：《隋書》*Sui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2 年）。

- 宋·朱熹 Zhu Xi 著，陳俊民 Chen Junmin 校編：《朱子文集》*Zhu Zi Wen Ji* 第 2 冊（臺北 Tapei：德富文教基金會 De Fu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2000 年）。
- 宋·朱熹 Zhu Xi：《詩序辨說》*Shi Xu Bian Shuo*，朱傑人 Zhu Jieren、嚴佐之 Yan Zuozhi、劉永翔 Liu Yongxiang 主編：《朱子全書》*Zhu Zi Quan Shu* 第 1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 Hui Education Press，2002 年）。
- 宋·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注》*Si Shu Zhang Ju Ji 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3 年）。
- 宋·袁燮 Yuan Xie：《絜齋家塾書鈔》*Jie Zhai Jia Shu Shu Chao*，收入張壽鏞 Zhang Shouyong 輯刊：《四明叢書》*Si Ming Cong Shu* 第 25 冊（臺北 Ta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mpany，1988 年）。
- 宋·袁燮 Yuan Xie：《絜齋毛詩經筵講義》*Jie Zhai Mao Shi Jing Yan Jiang Yi*，收入張壽鏞 Zhang Shouyong 輯刊：《四明叢書》*Si Ming Cong Shu* 第 11 冊（臺北 Ta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mpany，1988 年）。
- 宋·袁燮 Yuan Xie：《絜齋集》*Jie Zhai Ji*，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57 冊（臺北 Ta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3-1986 年）。
- 宋·真德秀 Zhen Dexiu：《西山文集》*Xi Shan Wen Ji*，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74 冊（臺北 Ta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3-1986 年）。
- 宋·陸九淵 Lu Jiuyuan 著，鍾哲 Zhong Zhe 點校：《陸九淵集》*Lu Jiuyuan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0 年）。
- 宋·楊簡 Yang Jian：《五誥解》*Wu Gao Jie*，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57 冊（臺北 Ta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Ltd.，1983-1986 年）。
- 宋·楊簡 Yang Jian：《慈湖詩傳》*Ci Hu Shi Zhuan*，收入張壽鏞 Zhang Shouyong 輯刊：《四明叢書》*Si Ming Cong Shu* 第 7 冊（臺北 Ta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mpany，1988 年）。
- 宋·楊簡 Yang Jian：《先聖大訓》*Xian Sheng Da Xun*，收入張壽鏞 Zhang Shouyong 輯刊：《四明叢書》*Si Ming Cong Shu* 第 8 冊（臺北 Ta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mpany，1988 年）。
- 宋·楊簡 Yang Jian：《慈湖遺書》*Ci Hu Xian Sheng Yi Shu*，收入張壽鏞 Zhang Shouyong 輯刊：《四明叢書》*Si Ming Cong Shu* 第 10 冊（臺北 Ta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mpany，1988 年）。



- 宋·楊簡 Yang Jian 著，明·周廣 Zhou Guang 輯：《慈湖遺書續集》*Ci Hu Yi Shu Xu Ji*，收入張壽鏞 Zhang Shouyong 輯刊：《四明叢書》*Si Ming Cong Shu* 第 10 冊（臺北 Ta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mpany，1988 年）。
- 宋·黎靖德 Li Jingde 編，王星賢 Wang Xingxian 點校：《朱子語類》*Zhu Zi Yu Lei*（臺北 Tapei：華世出版社 Hua Shi publishing company，1987 年）。
- 宋·蔡沈 Cai Chen 著，宋·朱熹 Zhu Xi 授旨，嚴文儒 Yan Wenru 校點：《書集傳》*Shu Ji Chuan*，收入朱傑人 Zhu Jieren、嚴佐之 Yan Zuozhi、劉永翔 Liu Yongxiang 等編：《朱子全書外編》*Zhu Zi Quan Shu wai bian* 第 1 冊（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0 年）。
- 元·脫脫 Tuo Tuo：《宋史》*Song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7 年）。
- 清·朱彝尊 Zhu Yizun：《曝書亭集》*Pu Shu Ting Ji*，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318 冊（臺北 Ta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1986 年）。
- 清·江永 Jiang Yong 著，林勝彩 Lin Shengcai 點校，鍾彩鈞 Zhong Caijun 校訂：《善餘堂文集》*Shan Yu Tang Wen Ji*（臺北 Tapei：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2013 年）。
- 清·全祖望 Quan Zuwang：《鮚埼亭集外編》*Jie Qi Ting Ji Wai Bian*，收入沈雲龍 Shen Yunlong 編：《明清史料彙編》*Ming Qing Shi Liao Hui Bian* 第 9 集第 5 冊（總第 47 冊）（臺北 Tapei：文海出版社 Wen Hai Press Company，1968 年）。
- 清·紀昀 Ji Yun 等著，魏小虎 Wei Xiaohu 彙訂：《四庫全書總目彙訂》*Si Ku Quan Shu Zong Mu Hui Ding* 第 1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2 年）。
- 清·黃宗羲 Huang Zongxi 原著，全祖望 Quan Zuwang 補修，陳金生 Chen Jinsheng、梁運華 Liang Yunhua 點校：《宋元學案》*Song-yuan Xue 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6 年）。

## 近人論著

- 王晶 Wang Jing、王凌皓 Wang Linghao：〈南宋四大書院之教學藝術美〉“The Teaching Art Beauty in Four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現代教育科學》*Modern Education Science* 2009 年第 6 期（2009 年 6 月），頁 39-42。
- 王曉龍 Wang Xiaolong、司學紅 Si Xuehong：〈宋代書院教育〉“Academy Education in the Song Dynasty”，《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 Science*)第 32 卷第 4 期(總第 136 期)(2007 年 7 月),頁 80-82。
- 李承貴 Li Chenggui、賴虹 Lai Hong:〈論楊簡的儒學觀〉“Yang Jian's View of Confucianism”,《南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第 28 卷第 1 期(1997 年 3 月),頁 9-16。
- 李振興 Li Zhenxing:〈尚書大、小序辨疑〉“The Discussion of *Shang Shu Da Xu* and *Xiao Xu*”,《尚書流衍及大義探討》*Shang Shu Liu Yan ji Da Yi Tan Tao*(臺北 Tapei:文史哲出版社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82 年),頁 77-86。
- 周華山 Zhou Huashan:〈「意義」——詮釋學的啟迪〉‘Meaning’——*The Enlightenment of Hermeneutics* (臺北 Ta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2001 年)。
- 洪湛侯 Hong Zhanhou:《詩經學史》*Shi Jing Xue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年)。
- 陳良中 Chen Liangzhong:〈朱子與蔡沈《書》學異同考論〉Discussions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Studies of the Book by Zhu Zi and Cai Shen,《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2010 年第 3 期(2010 年 6 月),頁 75-81。
- 陳夢家 Chen Mengjia:《尚書通論》*Shang Shu Tong Lu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年)。
- 郭善兵 Guo Shanbing:〈略述宋儒對周天子宗廟禮制的詮釋——以宗廟廟數、祭祀禮制為考察中心〉“Research on the Annotation of the Ritual System of the Emperor’s Ancestral Temple in the Zhou Dynasty by the Confucian Scholars of the Song Dynasty”,《東方論壇》*Oriental Forum* 2006 年第 5 期(2006 年 10 月),頁 99-104、124。
- 馮友蘭 Feng Youlan:《中國哲學簡史》*Zhong Guo Zhe Xue Jian Shi*(北京 Beijing: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2004 年)。
- 程元敏 Cheng Yuanmin:〈《書序》稱名〉“*Shu Xu Cheng Ming*”,《書序通考》*Shu Xu Tong Kao*(臺北 Tapei: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 Ltd., 1999 年),頁 9-16。
- 程元敏 Cheng Yuanmin:《先秦經學史》*Xian Qin Jing Xue Shi*(臺北 Ta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2013 年)。
- 黃忠慎 Huang Chungshen:《輔廣、楊簡《詩經》學研究》*The Study of the Shi Jing by Fu Guang and Yang Jian*(臺北 Tapei:經學文化事業公司 Jing Xue Culture Business Company, 2017 年)。
- 黃忠慎 Huang Chungshen:〈心學與政治之間——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析論〉“Between the Mind Studies and the Politics: A Discussion on Yuan Xi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o Poetry*”,《臺大中文學報》*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第 52 期(2016 年

3月)，頁95-134。DOI: 10.6281/NTUCL.2016.03.52.03

葉國良 Ye Guoliang：〈〈書序〉的異名與寫作時代〉“The Different Names and Writing Times of Shu Xu”，收入葉國良 Ye Guoliang、李隆獻 Li Longxian：《羣經概說》*Qun Jing Gai Shuo*（臺北 Tapei：大安出版社 Da An Press，2005年），頁63-64。

葉文舉 Ye Wenju：〈「詩之有《序》，如日月之有雲，如鑒之有塵」——從心學內涵論楊簡廢《序》的思想成因〉“On the Ideological Causes of Yang Jian's Abolition of Pref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d Connotation”，《詩經研究叢刊》*Shi Jing Yan Jiu Cong Kan* 第27輯（北京 Beijing：學苑出版社 Xue Yuan Publishing House，2015年），頁427-443。

劉起鈞 Liu Qiyu：《尚書學史》*Shang Shu Xue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9年）。

## **To analyzing Yang-Jian and Yuan-Xie for their attitude of *Shu-Xu* and *Shih-Xu*——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eart-mind Theory scholars attitude of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ript**

Huang, Chung-shen

( Received January 17, 2018 ; Accepted October 9, 2018 )

### Abstract

This article observed the Lu Jiu-yuan's apprentice Yang-Jian and Yuan-Xie's attitude of *Shu-Xu* and *Shih-Xu*. Through this article, we could found, In Shang-shu, Yang-Jian agreed the "*Shu-Xu*" written by Kong An-Guo, but criticized him did not know doctrine. The old saying said the "*Shu-Xu*" written by Confucius, Yang-Jian was once speculated that was written by Kong An-Guo, even so, Yang-Jian still follow *Shu-Xu*'s explanation. But in *Shih-Jing*, Yang-Jian considered the *Shih-Xu* was written by the Han Dynasty confucianism Wei Hong. Therefore, Yang-Jian unable to accept his point of view completely. Yuan-Xie's attitude was not quite the same. In regard to the "*Shu-Xu*" and *Shang-Shu-Kong-Chuan*, Yuan-Xie was not interested on it. But Yuan-Xie convinced that Confucius wrote hundreds of *Shu-Xu*, besides, Yuan-Xie considered the *Shih-Xu* know doctrine, therefore, Yuan-Xie was willing to accept *Shih-Xu*'s point of view.

In summary, we could know, the heart-mind theory scholars could accept or discard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ript, the sticking point is that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whether know doctrine, the judgment criteria of these is according to personal subjective opinion, therefo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 results of the heart-mind theory scholars appearing the difference in the same on their results.

Keywords: "*Preface to the Classic Book of Documents*", "*Preface to the Classic of Poetry*", Scholars of mind study, Yang Jian, Yuan Xie